

◎美在生活

文人的藏书生活

□罗常军



古画中的书架

藏书有两种：一种是官藏，一种是私藏。与官藏受皇命不同，文人“藏君子之书”是一种自发自觉的文化活动。文人士大夫穷一生之力，兢兢简编，艰险不避，用情于书，几成痴迷，“淫嗜生应不休，痲癖死而后已”，孜孜追求精神生活的体悟和内心修养的悠逸。如果说文人士大夫读书著书抱有求取功名之心的话，那么，访书聚书赏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趣味、格调 and 境界，彰显了文人士大夫藏书生活的文雅气质和审美追求。

访书——

“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

以书会友，访书即是访友。文人为访求好书而自甘清苦，纵使散尽千金，却怡然自得，其趣味高雅。

聚书缘自爱书。爱书是文人与生俱来的基因，这种基因根植于对知识的顶礼膜拜。“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谢肇淛《五杂俎》）。也有异于常人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晚唐皮日休诗云：“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六藏·日藏》）更重要的是，书还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思想的源头活水。宋代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月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生活中只要有了书，哪怕“木落水尽千崖枯”，也能“迥然吾亦见真吾”（翁森《四时读书乐》）。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

清末士子的“振兴民族经济梦”

——北京发现与交通银行相关科举试卷

□赵兴林

收藏家李烈钧女士，曾将所有藏品运抵北京市通州区潞县书院，一边分类进行整理与研究，一边请专家对有关藏品进行鉴定，以便择机布展。李烈钧在整理科举文物资料时，发现了一批与“交通银行”密切相关的科举试题、会试和乡试试卷。

资料显示，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存续至今超过百年历史的民族银行。一个世纪前的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1907年12月8日），时任清邮传部尚书陈璧、左侍郎吴重熹、右侍郎于式枚、右侍郎郭曾忻，共同上奏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收回轮路电邮经营权，设交通银行”折。次年，清廷即用募集款项成功收回“京汉铁路路权”为开端，进而开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制性质的商业合作银行；至此，交通银行登上中国经济金融舞

台亦称芸台”（徐坚《初学记》）。檀香可宁神，令人思绪悠远，南宋陆游《即事》云：“语君白日飞升法，正在焚香听雨中。”茶香可静气，煮雪烹茶恬淡至极。如仿倪瓚之清閟阁，“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明史》本传），刹那间，一股古雅深邃、静谧无边的书香气息就能扑面而来。

诗印之雅。文人喜吟诗，每有所得，或抒藏书之情，或言藏书之志，留下了许多藏书诗，也留下了许多文坛美谈。最著名者莫过于唐代韩愈赠予邺侯李泌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这就是典故“邺架之藏”的出处。如果看到谁家门前高悬“邺架留芳”牌匾，则基本可以判定，主家是个读书人，且姓李无误了。除了藏书诗，文人还善刻藏书印，一枚枚小小的方印，或宣示藏书主人，如田吴焯之“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或抒发藏书之情，如陈简应之“精校善本，得者珍之”印；或表达藏书之趣，如李馥之“曾在李鹿山处”印等。这些印章篆刻精美，印泥鲜艳夺目，使人赏心悦目，既流露出文人的爱书之情，又表达了文人的读书之乐，还体现了文人某种豁达与通透。

赏书——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

不为功利赏闲书，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文人在赏书读书中，追求人生真味，陶然自得，其境界高远。

藏书非为读。文人藏书何其多，岂能遍阅？不为读，仍藏之，何故？有三功也。一曰校书之功。书在传抄、刻印、排印时，错误在所难免，如不及时校勘，其害深也。二曰治书之功。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魏书·李业兴传》）。三曰抄书之功。南宋尤袤“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影记手抄若干古书”。明代叶盛“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其风流好事如此”（钱大昕《听雨轩集跋》）。正是文人忘我的校书、治书和抄书，为后世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宝藏，如今的古籍善本就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书非借不读。家有藏书万千，可自嗜、可借观、可共赏。比如说明代越琦美，“性嗜典籍，所哀聚凡数万卷，绝不以借人”（龚自本《烟艇永怀》）。不外借，无非担心一旦丢失便不可再得，“仅有单行之本，焚后不复见于人间”（曹溶《绉云楼书目题词》）。对于不外借者，人们应当抱以理解和同情。当然，借观是值得鼓励的。文人与书为友，亦能因书得友，“幸而遇知音者，如著之珍之”（曹溶《流通古书约》）。借人典籍者，也当须精心呵护，如遇缺坏则为之补治。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农食”（《晋书·范平传》）。这种风范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因为藏书不只为情趣，不用不借不考，就如“守书奴”无异，行之不远矣。谁能知道，藏家百年后，这些书会迎来怎样的新主人呢？

清淡好读书。“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翁森《四时读书乐》）。文人自视清高，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高，只有这种清高立，能令其于物欲横流中洁身自好，超凡脱俗。或坐或立于书斋别院，“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尤袤《遂初堂书目序》）。人生最惬意、最纯粹的时光，莫过于这种自在随性、自由遐思的读书时光。于文人而言，一旦步入书斋，拿起书来赏玩也是一种心灵慰藉。陆游诗云：“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假中闲户终日偶得绝句》）净手焚香，品茗听音，在暖阳正好的芸窗下，静坐清读，这是一桩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因拥有了聚书之乐，而拥有了门槛最低却是世间最美的生活。

访得可爱书，需有雅室居。或楼或室，文人聚书旨在构建一个独特的心灵空间，任天地岁月悠悠，其格调高贵。

斋号之雅。文人藏书之所并无定规，可筑楼于山间水滨，可取一室隐于市郊野，斯是陋室一间，亦要出尘清雅。东晋陶潜辞官归隐“归去来馆”，写下千古名篇《归去来辞》。清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甲于两浙，黄宗羲、全祖望皆为其作记。晚清曾国藩有“富厚堂”，又称“八本堂”，自取家训以记之。不仅室名斋号有雅称，文人也因藏书得美名。唐代李泌家中藏书汗牛充栋，被誉为“书城”，后汉曹平积石为仓以藏书，号曰“曹氏书仓”，五代孟景翌出门藏书跟随，终日手不释卷，谓之“书窟”，不一而足。如细细玩味，又别有一番风味。

藏书之雅。清代郑板桥书斋有联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文人藏书“绝俗之趣”，宜小宜香宜雅。小能聚气，不热不寒，连乾隆帝三希堂也不过八平方米而已。香即芸香、檀香和茶香，书中所夹芸草有异香，可避蚊虫，故藏书

台。经细心辨认，尚书陈璧等四位上司官员中，翰林出身的于式枚有乡试和会试试卷，举人出身的吴重熹有乡试试卷，翰林出身的郭曾忻有会试试卷。而这些试卷，皆为经书式折叠，封面贴着红纸条，上书“某某科会试（或某某省乡试）试卷”。内文内容则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科举士子祖宗十八代和师承情况，后一部分则为四书五经的策论和诗赋。

在堆积成山的故纸堆中，专家们还幸运地找全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状元张謇（1922年5月至1925年5月时任交通银行总理），从乡试到会试的试卷以及殿试状元试卷。从科举试卷得知，籍贯为江苏南通人的张謇，早在1885年来京参加顺天府乙酉科乡试，取得第二名；直至9年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特设恩科，才得

终于要说到小麦了。我们的早餐可能是全麦面包，父母的则可能是馒头。暂且不去讲玉米、土豆、花生和辣椒来自中南美洲，葵花籽和南瓜来自北美，高粱来自非洲，葡萄与橄榄来自地中海这些人尽皆知的常识，来自西亚的小麦、大麦和燕麦，在世界大范围的传播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怎样估价也不为过的。始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小麦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了整片欧亚大陆，东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欧洲各国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

小麦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这个地带大体包括现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最初被驯化的栽培小麦有两个品种，即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后，二粒小麦向东传播到伊朗高原北部与里海南部之间的河谷地区，又与当地自然生长的粗山羊草发生了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的栽培品种。这就是今天广泛种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也被称为普通小麦或面包小麦。

◎文明密码

西方的小麦如何成为中国的馒头

□杨雪梅



世界主要的几大古代文明都建立在以种植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基础上，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到后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那么，小麦又是什么时间、通过怎样的通道进入到中国的？

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在距今7000年前后，小麦已经东传到中亚地区的西南部，但意外地停滞了数千年后才继续向东进入东亚地区。目前认为，小麦向东传播受阻的主要因素是西亚和东亚的气候特点不同。小麦起源的西亚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阴冷湿润，主要降雨集中在冬春两季；而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主要降水集中在夏季。这种降水季节的时段对小麦的生长非常不利。小麦是夏收作物，冬播夏收，春季是生长时期，但东亚地区的春季普遍缺少雨水，夏季频繁的降雨又会影响到小麦的成熟和收获。这应该是造成小麦东传延缓的主要原因。

然而小麦终究还是继续向东传播，并进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后逐步取代了当地本土农作物粟和黍，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如果从历史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我们会提到《左传》记载的“不能辨菽麦”。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战国，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种植小麦了，以至于当时的普通人都应该能够分清大豆和小麦这两种农作物。当然在殷墟的甲骨文中也已经出现了“来”和“麦”这两个字，“来”指小麦，“麦”被释为大麦。“来”字是个象形文字，本意应该是专指小麦外来，学界认为，小麦迟在距今3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已经传入中国。

而距今3000年以前的小麦的传播轨迹则需要依靠考古资料。与其他考古出土文物相比，遗址中的古代小麦遗存不易发现。但无论是在上世纪还是本世纪以来

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小麦遗存的发现。比如上世纪发现的甘肃民乐的东灰山遗址、陕西武功的赵家村遗址、安徽亳县的钓鱼台遗址、云南的剑川海口遗址以及新疆的罗布泊古墓沟遗址、巴里坤遗址和哈密五堡古墓等。

甘肃民乐的东灰山遗址曾经非常引人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对采自该遗址的土样（黑炭土）的测年结果，判断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后。2005年，一支由中国和美国考古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专程前往东灰山遗址，根据文化层重新采集了土壤样品并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麦和大麦遗存。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从浮选结果中选择了10余份系列的炭化麦粒样品，应用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对这些出土炭化麦粒直接进行测年，绝大多数小麦样品的测年结果都落在了距今3600—3400年之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东灰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及其包含的小麦遗存应该属于四坝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后。

进入新世纪后，在我国发现

的距今3000年以前的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已达30余处，其中有近百例小麦遗存被直接进行了测年，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年代数据。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是一处史前聚落遗址，包括了大汶口、龙山和东周时期的文化堆积，2005年进行考古发掘时浮选出了小麦遗存。经测定时代为距今3905±50 BP，校正年代为4450—4220 BP。赵家庄遗址出土的小麦遗存既有明确考古学文化背景又有准确测年数据，支持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能早到距今4500年，由于这个年代目前仍然是孤证，最终的定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支持。

小麦传入中国的途径之一是欧亚草原通道。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小麦被分布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所接受，并迅速由西向东传播，通过阿尔泰山—天山区到达蒙古高原地区，被分布在蒙古高原南缘的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区所接收，然后通过多条南北向的河谷通道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直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也是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随着小麦传入的还有青铜冶金术等其它关键技术。

而传入西北地区的小麦走的可能是绿洲通道，小麦自中亚出发，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绿洲通道向西传播，穿越河西走廊，进入黄土高原地区。这条绿洲通道到了后来就是丝绸之路。

值得研究的细节特别有趣。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小麦传入中国时只是传入了种植技术，与之相应的饮食传统并没有被传入或者被接受。在古代粒食传统背景下，小麦和水稻、小米一样也许被煮着吃，很难下咽。因此在北方的产量和播种面积并不大。直到秦汉，将小麦磨成面粉后蒸成馒头，它的面积与产量才大大提高，并最终代替了粟与黍。和西方烘烤的面包传统不同，馒头是中国蒸食传统的代表，和面条一样深得人心。